

近代中国 域外汉学评论萃编

李孝迁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 国外汉学评论萃编

1911—1949

丁福保整理

近代中国 域外汉学评论萃编

李孝迁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 / 李孝迁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25-7223-6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汉学—国外—近代—文集
IV. ①K207. 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6145 号

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

李孝迁 编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6.5 插页 5 字数 843,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7223-6

K·1855 定价: 1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 校 缘 起

20 世纪以来,国际汉学界开始清理以往汉学研究的成绩,关于东方学或汉学的论文目录索引与其他展望、回顾之类的论著发表颇多。在法国,考狄(Henri Cordier)于 1904 ~ 1908 年在巴黎出版《西人论华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四巨册,1924 年又刊补遗一卷;在俄国,1911 年俄国东方学会会长巴尔托里德(W. Barthold)在圣彼得堡出版讲义稿《欧洲及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德译本于 1913 年出版,日译本于 1937 年出版);在德国,叶乃度(E. Erkes)和辛德勒(B. Schindler)合撰《欧洲的中国学史略》,海尼士(Erich Haenisch)发表《近五十年来德国的汉学》,福兰阁(Otto Franke)先后撰写《德国的中国学》、《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在日本,出版了相当多汉学史论著,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共立社,1932)和《欧美的中国研究》(创元社,1942)、岩村忍《十三世纪前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三省堂,1939)、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萤雪书院,1940)等。“五四”前后域外汉学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刺激异常明显,学界主流亦倡导参用西方、日本汉学或东方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学问,更需要了解异域研究之动态。加之在民族意识不断被强化的 1920 ~ 1930 年代,国内学界欲与国外汉学争胜,为了解“彼之知我”,国内学者开始注意译介、研究国际汉学史。

国内学界汉学知识的来源渠道大体有:(1) 国外汉学家来华访问考察,热心结交中国学者,如伯希和、高本汉,长期保持联系,通过私人交际网络,国内学者接触到了域外新知。同时,有的汉学者在华演欧洲汉学之发展,如 1930 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马古烈(G. Margoulies)来华访问演讲“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1932 年美国盖尔(Esson M. Gale)在万国扶轮社演讲“各国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等;(2) 海外留学生回国热心译介国际汉学,日文有王古鲁、梁绳祎、莫东寅、何建民、钱稻孙、杨炼等,法文则有冯承钧、李璜、杨堃、王静如、张世禄、曾觉之、冯沅君等,积极译介域外汉学;(3) 国内图书馆(尤其北平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重视购藏外文汉学著作,1930 ~ 1940 年代国内还影印了大量西文汉学著作;(4) 在中国发行的中外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益世报》、《史地学报》、《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禹贡》、《食货》、《燕京学报》、《中德学志》、《汉学》,以及西文报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京报》(*Peking Gazette*)、《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中国评论周刊》(*China Weekly Review*)、《教务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书林季刊》(*Philobiblon*)等,刊登了大量的汉学资讯,在促进国内学界了解欧美、日本汉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 世纪上半期,域外汉学以法、德、日最有成绩,中国学者赴此三国留学人数亦多,国内学界自然侧重介绍他们的汉学发展。刊物上发表的汉学史论文,以译文居多,基本属翻译或编译,像王静如讲法国汉学史、王古鲁写日本汉学史、梁绳祎写欧美日本汉学史,这种情况大体来说并不多见。即使有些名为“撰”而实为“译”,编译成分甚多。莫东寅的名著《汉学发达史》,编译成分亦多,当初只是为了教学需要所编的一本讲义而已。民国学者了解外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日人成果,尤以参考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和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为主。之所以指出国内汉学史研究存在“翻译多而自著少”的特点,旨在揭示既有成果中翻译或编译者比重过多,而体现中国学者研究水平的作品则少。这并不是说翻译价值不大,恰恰相反,正因汉学译业成绩不佳,致使自著者少。

民国时期有生气的汉学史论著非常之少,多半为目录或索引式著述。日人所写的汉学史著作,如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亦具浓厚的文献目录整理的特点。1930 年代国内曾兴起一股索引热,或许影响到汉学史研究。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本索引式著作。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研究仍是基础性的资料搜集,贝德士(M. S. Bates)、李小缘的工作更为明显。当时发表的汉学家传记多为简述生平之后,附录书目,带有原始资料整理性质,与“研究”尚有距离。国内学者撰写的专题式论文屈指可数,如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等,则少之又少。这种状况正说明了国内汉学史研究尚处于资料积累阶段。

中国学人通论各国汉学发展史的文字较为罕见,大量的是汉学著作书评,说明国内学者多把汉学成果作为个人研究的参考,而把汉学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自觉程度并不高。这类书评除了发表在国内中文报刊,还有些学者如胡适、丁文江、蒋廷黻、陈衡哲、萧公权、雷海宗、郭斌佳、杨堃、李安宅、钱钟书等,用英文撰写,发表于海内外英文刊物,如《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燕京社会学界》、《华裔学志》、《天下月刊》、《书林季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他们所预设的读者恐怕不是国人,主要针对国际汉学界,内容经常以负面评价为多,似暗示中国学者试图打破外人对中国学问的话语权,力争在国际汉学界有更多的发言空间。

一般以为在大学开设汉学史性质课程应属晚近之事,但 1930 ~ 1940 年代国内少数高校即已设置此类课程。1937 年陆侃如说:“‘汉学’现在非常受人的重视,各学校都列入专门的课程,如清华大学考取留美学生时,题中常有几个关于‘汉学’的,如没有看过高本汉(Karlgren)的书,就不能考取留学。北大设有专科,对欧洲或日本的‘汉学’研究皆由专家来讲。一种学问既设了专科,内容一定很复杂,必须对它有基本的常识。”^[1]1920 年代末以来,陆续出现一些具有汉学史性质的课程。1929 年辅仁大学史学系开设“西文汉学书阅读”^[2];1930 年暨南大学开设一门“近世域外研究中国文学情形”^[3];1931 年北京大学

[1] 陆侃如讲,张愍言记:《欧洲“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范学院周刊》第 244 期,1937 年 5 月 10 日。

[2] 《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5 页。

[3] 《国立暨南大学一览》(1930 年度),第 7 页。

中国文学系刘复(半农)讲“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钱稻孙讲“日本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1];1940年代邵循正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史籍名著(西方学者中国史地论文选读)”^[2];1941年度,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拟请萧正谊讲“日本学者对于汉学之贡献”,洪业讲“西洋学者对于汉学之贡献”^[3]。此外,1930~1940年代不少高校国文系开课介绍西方学者对中国音韵学研究之贡献与方法,如罗常培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周祖谟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讲授过此类课程。在高校开设通论性汉学史课程,则有梁绳祎在中国大学、莫东寅在北京大学。汉学史课程难度颇高,授课者需要把握欧美、日本汉学发展的渊源、流变与现状,有能力开设此课者当为少数。通论性汉学史课程出现极少,较多的则是专题式汉学史,如外人研究中国音韵学、中国文学等,这种状况正说明了当时国内汉学史研究总体水平不算高。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译介汉学史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汉学知识从无到有,从翻译外人著述进入自我研究,从少数人关注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从索引式的资料整理进展到专题研究,从个别汉学著作评论到综合性汉学史论著,从作为研究参考到成为一种专学,汉学史研究逐渐以一专门之学显现于民国学界。但1937~1949年国内基本处于战乱状态,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干扰。研究汉学史需要依靠大量的外文资料,战争期间难以充分接触国外书刊,所以身处大后方的学者在汉学史研究方面几乎没有成绩;相对而言,沦陷区生活较稳定,获得史料的渠道较多,并且影印了大量西文汉学著作,对推动汉学史研究大有裨益。沦陷区刊物《国学丛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东方文化》、《北华月刊》等,发表了许多汉学史论文,梁绳祎、杨堃、王静如、莫东寅诸氏大作均发表于沦陷区。梁绳祎在北平中国大学主讲“外国汉学研究”,莫东寅在北京大学讲授“东方研究史”,亦在北平沦陷时期。沦陷区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机构: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汉学资讯仍有渠道进入沦陷区学界,尤出现了较多日本汉学史论文。

沦陷区与大后方学者交流似不通畅,不甚了解对方的学术动态,几乎没有发现大后方学者对沦陷区汉学史研究有过任何回应。而且,沦陷区学者之间的交流似也不多,学术研讨气氛不浓,梁绳祎、莫东寅开设汉学史课程,影响甚微。再如,莫东寅《东方研究史》原本是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除了杨堃提及外,没有发现一篇书评或介绍文字。相比之下,趁抗战爆发之前出版的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虽系自费发行,但书评连连,于学界、社会影响都不一般。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战乱时期学术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新知传递往往局限于某些区域,旋起旋灭,不易辐射及全国学界。总之,沦陷区汉学史研究由于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沟通,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在学界影响很小。更何况,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大后方学者控制着学界的话语权,原先在沦陷区的很多学者被边缘化,似乎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历史记忆,沦陷区所取得的那点汉学史研究成果,渐被人所遗忘。

1949年后大陆学风丕变。1950年代初国内仍能见到一些文字报道海外汉学。1955

[1] 《北京大学法文理学院各系课程大纲》(1931年度),《北京大学日记》1931年9月14日。

[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3] 《燕京新闻》第7卷第11期,1940年11月9日。

年第八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官方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1956年第九届派翦伯赞、张芝联、夏鼐、周一良参加,当时官方并不排斥与西方汉学界的学术交流^[1]。但1960~1970年代中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汉学史研究几成绝响。《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2卷,商务印书馆,1961、1962年)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商务印书馆,1962年)两部著作近120万言,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译《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6年),本应对推动斯学研究有所助益,然选译之目的却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学术环境里,相关资料很难接触到,更何况涉足汉学史领域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结果自然是无人问津。于是,1930年代以来的汉学史研究缘于学术传承多次断裂,以致今人误认“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

而恰恰在这个时期,香港、台湾地区却发表了大量的汉学史论文,出现了一股汉学史研究热。1962年汇集成《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多为各国通论性汉学史论文,侧重介绍“二战”后汉学研究状况,对战前国际汉学,平心而论,总体研究水准并不比梁绳祎、莫东寅、王古鲁、杨堃等人高明,有的仅是低水平的重复。令人遗憾的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仍以《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作为重要参考书,足见国内在汉学史研究领域进步之缓。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忽视梳理本土汉学“研究史”,没有细致清理前人的成绩,想当然以为当今汉学史研究是“无中生有”之事业,或为要因之一。

为了能够全面反映1949年之前国内学术界汉学史译介、研究的基本情形,同时以期今人准确认识前人工作,在借鉴、吸取先贤业绩的基础上,“接”着往下做,故编辑整理这本资料文献汇编,题名《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十多年前,我在翻阅近代文献过程中,陆续见到不少中国学者翻译或自撰的有关汉学史文章,深感这些文献对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史学史乃至国际汉学史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文字散落在各种中西文报刊,迄今没有较为完备的目录索引可供按图索骥,于是全力爬梳有关汉学的近代文献,所获颇多,遂有日后编辑此书的想法。

关于这本资料集需略作说明:

一、本编所收录的文献均发表于1949年之前,作者不限国籍,但需属中文或中译文;

二、本编所谓“汉学”,不仅指严格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亦指广义上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包括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

三、本编资料来源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报刊,凡已收入今人整理的文集或其他资料汇编的文献,一般不予收录;

四、本编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作了标点、分段。有些错字、别字、衍字、倒误等,则径为改正,不出校注;

五、本编涉及西文人名、地名、书名烦杂,原文误拼甚夥,大多经核实直接校正,不出校注;

[1] 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六、本编涉及人名、地名、书名在不同文献略有差异,不作统一,但在单篇文献则作统一处理;

七、本编原文注释一律改为脚注,编校者所注标“李注”,以示区别;

八、本编附录“篇目举要”,不包括正文已收录的篇目,分中、英文两类。英文篇目系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于中外报刊,或外国学者所写并发表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刊者。中文篇目相对完备,而英文篇目仅为编校者寓目所及,并未作全面整理;

九、本编所收录的文献,少数相关权利人虽经编校者多方努力仍无法取得联系。为尊重著作权,故特此声明,请有关权利人与编校者联系。

本编分为通论篇、国别篇、专题篇、人物篇、书评篇、机构篇,并附录“篇目举要”,旨在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汉学知识的状况。原计划有英文篇,鉴于体例和篇幅,只好割舍。本编所收录的文章,有的是演讲稿,有的系专题论文,有的是译作,学术价值各有不同,可以体察中国学界最初汉学史译介、研究的真实生态。关于译文,是否收录取决于内容,而不是译笔。事实上,这些译文的翻译质量大多不高明,有的近乎劣质,不堪卒读,但鉴于内容的独特性,依旧收录,请读者谅解。本编只是选集,所选是否妥当,受限于我的学识和眼界,若蒙通人指教,则感激之至。至于校的部分,更是没有把握,常识性错误当不在少数。文献所关联的知识之博杂,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所幸现今网络资源相当丰富,检索亦方便,为校勘工作提供了捷径。

最后,我要对编校这部书有关的师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坦白说,我不是特别勤奋的人,也缺乏毅力,经常是想法多而实践少。更为实际的考虑是,编校这类文献资料完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又不算科研成果,吃力不讨好,动力自然不足。计划编校这部书,最初跟师兄马少甫、王应宪两位谈起过,得到他们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每当偶获一二篇文献,欣喜不已,他们是可以跟我分享快乐的人。业师邬国义教授治学堪称朴实之楷模,我个人求学深受他的影响,每有问,所答辄过吾所望。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国内学术出版之重镇,拙编承吕健、吕瑞锋两位先生的热心和无私帮助,得以在该社顺利出版,不胜铭感之至。

李孝迁

2014年3月13日于紫晶南园

目 录

编校缘起	李孝迁 (1)
------------	-----------

通论篇

欧人中国研究溯源	盛 志 (3)
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	唐敬杲 (13)
外国汉学研究概观	梁绳祎 (34)
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	马古烈 (51)
各国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	Esson M. Gale (56)
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	K. S. Latourette (58)
近代“汉学”研究论	马伯乐 (65)
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	桑原隲藏 (78)
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上之影响	徐家齐 (84)
西洋汉学与中国文明	陈受颐 (93)
欧洲之汉学	孟宪承 (96)
外国汉学研究论	梁绳祎 (100)

国别篇

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之研究	青木富太郎 (111)
日本之东洋史研究	莫东寅 (134)
关于中国学之问题	吉川幸次郎 (144)
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	长濑诚 (150)
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	方 豪 (163)
英国的汉学家	华 五 (166)
法国支那学小史	沙 畹 (171)
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 影响	王静如 (176)

德国人汉学的研究	韩奎章 (187)
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海尼士 (198)
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	福兰阁 (208)
德国“支那学”的现状	耶捷 (219)
德国青年汉学家	傅吾康 (222)
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	拉多黎 (226)
美国研究汉学之现状	邓嗣禹 (229)
美国的汉学研究	陈梦家 (231)
俄国现在研究中国文艺的情形	孟择理 (233)
印度之汉学	谭云山 (239)

专题篇

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	梅光迪 (245)
西洋学者对于中国语音学的贡献	张世禄 (250)
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	石决明 (257)
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	和田清 (265)
东西洋人对于中央亚细亚的研究概况	唐敬皋 (277)
关于东西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地的态度问题	陈守实 (286)
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	冯家昇 (291)

人物篇

欧洲“支那学”家	陆侃如 (299)
沙畹之撰述	冯承钧 (302)
论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 (306)
敬悼马伯乐先生	方豪 (308)
纪念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	陈定民 (311)
汉学家法国葛兰言先生	雨堂 (315)
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	幼春 (323)
卫礼贤教授及其著作	方志渊 (330)
尉礼贤的生平和著作	郑寿麟 (334)
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	方志渊 (338)
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姚士鳌 (342)

介绍高本汉先生	张世禄 (354)
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汪家正 (359)
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	三宅米吉 (362)
白鸟库吉及其著作	王古鲁 (378)
悼内藤虎次郎氏	非 云 (386)
交通史专家藤田丰八博士	小柳司气太 (389)
东洋史专家桑原隲藏	郑师许 (395)

书评篇

《中国文化之发达》	芷 荪 (401)
《中国史与文化》	陈恭禄 (403)
<i>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i>	雷海宗 (408)
费次者洛德的《中国文化小史》	陈受颐 (410)
<i>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i>	雷海宗 (414)
评西文中国古代史著作	雷海宗 (416)
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 (420)
<i>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i>	萧公权 (423)
《中国民间传说三讲》	采 薇 (425)
《中国旧史学》	朱士嘉 (426)
<i>Wang An Shih, A Chinese Statesman and Educationalist of the Sung</i> <i>Dynasty</i>	萧公权 (429)
《乾隆之禁书运动》	郭斌佳 (431)
<i>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i>	雷海宗 (436)
《远东国际关系史》	陈恭禄 (438)
《哈佛大学亚洲学报》	齐思和 (443)
评《清代名人传略》	黄维廉 (447)
评《中国的边疆》	陈宗祥 (450)
顾德利著《中国民族小史》	郭预衡 (453)
评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及《续编》	闻 宥 (456)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及《续编》	梁园东 (458)
介绍一本中国地理新著	洪思齐 (460)
评向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华 一 (464)

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慰 生 (467)
《中国经济与社会》	王毓铨 (472)
威特佛格尔著《中国经济与社会》	刘及辰 (478)
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	吕振羽 (483)
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	刘亚生 (487)
《东洋古代史》	铁 谷 (490)
《经学史论》	一 之 (492)
《中国文学论集》	默 之 (495)
评《先秦经籍考》	张季同 (497)
《兀良哈及靺鞨考》	梁园东 (500)
《满洲发达史》	林同济 (502)
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	陈子展 (505)
评盐谷温《元曲概说》	卢 前 (507)

机构篇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	古 鲁 (511)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	刘 厚 (515)
记巴黎中国学院	野 (520)
德国之中国文化研究机关	俞颂华 (523)
介绍北平之中德学会	祝 钟 (526)
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	胡隽吟 (529)
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概况	石埭壬 (536)
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	太初节译 (546)
记东洋文库与支那文库	亢 德 (555)
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	刘选民 (559)

篇目举要	(563)
------------	-------

❀ 通 论 篇 ❀

欧人中国研究溯源

盛 志

本篇内容：一、远古之欧亚交通，二、希腊、罗马人之中国观，三、中世纪阿拉伯人之中国知识，四、蒙古隆兴时代欧人之中国记述，五、海运大通后欧洲教士之中国研究，六、清中叶以前欧洲学者之中国研究。

欧人所谓汉学(Sinologie)，虽成立于十七世纪，然关于中国之知识传说，则自古有之。今就近年考古学者所得，及西土文献所见，约略述之。

一、远古之欧亚交通

汉族西来说，在今日已为过去。然据近十五年来远东考古学之进步，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及中日两国学者在河南、山西、南满、辽西等地发掘之结果，知河南渑池仰韶出土之器工花纹，与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及俄国西南基富城附近脱里波留(Tripolje)等地新石器时代遗物，极为相近。故想象新石器时代后期，华北各地与南俄及多脑河下流有文化交涉。又法国与西班牙间比利牛斯山中有巴斯克(Basques)族，瑞典、挪威北有拉勃(Laps)族，俄国、瑞典间有芬兰(Finns)人，均亚洲之黄人，何时迁入欧洲，已无可考。俄国南部黑海北岸当西元前五世纪至二世纪时，已有希腊人移植其地，以希腊之装饰品交易土产。西提亚(Skythia)人亦于此时，自亚洲北部移居黑海之北，保持其亚洲风俗服制。近俄人发掘西提亚人酋长陵墓，得衣服、弓矢、刀剑、形式装饰，多似古代蒙古中国。陵墓广大崇峻，亦类中国帝王之陵，与希腊式建筑迥殊，是西提亚人亦殆为由中国北部西迁者。今日治交通史者多相信在史前时期，东亚与西欧之间已有交通。民族迁徙，贸易往来，均有可能，则关于中国知识之西传，自非意外。惟其时既无文字，而地下遗迹之研究，方在萌芽，则明确之断案，自当待之异日。

二、希腊、罗马人之中国观

古代西人之称中国有二种：一为以“赛利斯”(Seres)指中国人，以“赛利克”(Serice)指中国之地，其语出于西人呼中国缙绢之 Serikon 及 Sericum(拟本阿尔泰族语)；又一为 Sin(Thin)指中国之地，Sinai(Thinai)指中国之住民，出于统一中国秦代之国号。而“赛利斯”之名似先出。盖缙绢西传，耸动欧人，故以名制绢之国。古希腊有地理学者斯脱拉波(Strobon，生西元前 54 年，卒西元后 24 年，当中国汉宣帝五凤四年至更始二年)跋涉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著《地理学》(Geographica)十七卷，书成于西元 23 年(更始

元年),为欧洲现存最古之地理书。其十一卷至十六卷记亚洲事,于十五卷一章第二十五节二十八节,始见 Seres 之名。然所知茫昧,仅谓 Seres 寿考,往往逾二百岁而已。其所传谓据亚历山大王幕僚鄂内锡突斯(Onesikritos)之说。鄂卒西元前 328 年(周宪王四十一年),其来源之古可知。其后罗马硕学白里内(Gaius Pling,西元 23—79)于西元 77 年(东汉章帝建初二年)著《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三十七卷,引据繁博,其记中国之事谓:

抵塔比斯(Tabis)山,山悬峙海滨。循海岸东北,过此乃见人迹。由甲斯便海至此,尚未及海岸全线之半,赛利斯国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濡之以水,理之成丝。识为锦绣,运至罗马。贵妇娇媛,裁以为衣,光艳夺目。人巧几竭,而地角亦至此尽矣。赛利斯人温厚可亲,羞与人侣,与森林中鸟兽无异,见人辄避走。虽愿与他国贸易,然皆待外人之来,不自求售也。

古代欧人由绢缁以知中国,然绢缁之来源,则鲜能言之。西元 174 年(汉灵帝熹平三年)希腊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已知赛利斯人织绢之丝,非来自植物,乃有虫曰塞儿(Ser),性类结网蜘蛛,饲以吐丝,然欧人亦不辨其是非。故 380 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希腊人马赛里奴斯(A. Marcellinus)著《史记》一书,仍谓林中有毛,其人勤加濯濯,梳理为细丝,织之成绢。其时绢之流行欧土,已极普遍矣。

二世纪中叶(汉桓帝时),希腊人托尔米(Claudius Ptolemy)著《地理志》,为古代名著,谓大地上人类可居之地,极东为无名地,与亚细亚极东之秦尼(Sinae)国及赛利克(Serice)为邻。又谓秦尼国北界赛利斯,东及南皆界名地,其西界印度恒河边地及大海。世传秦尼国都有铁城及种种奇事,皆无稽之语。于是 Seres 在北, Sinai 在南之说,颇为流行。盖自西元前三世纪末(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声威远播,商舶由海路传秦之名。及汉隆兴,仍以旧名呼之。一世纪末之书,《埃利特拉海(Erythrean)指南》始于赛利斯之外记 Sinai,可证其来自东南也。

自三世纪初,萨三朝波斯勃兴,遮断东罗马与东亚之交通。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学者殚精于神学研究。欧人对东方知识,一无增益。七世纪初,有埃及出身之史家席摩喀塔(Simokatta,约 580—630)仕于东罗马,著《莫利斯(Maurice)皇帝时代史》,多据直接见闻,及官府文书,为后世言东罗马史实者所重。其书称中国北部为 Taugas(拓跋),都城为库伯丹(Khubdon),其国中央由大河分为二。北为黑衣国,南为红衣国,两国抗争,南并于北。其民崇拜偶像,性温和,工技艺,善营商,国势隆盛。盖大江中分中国,及隋人统一南北之事,传于数万里外之东罗马史家。因六世纪末,东罗马与西突厥联合以当波斯,使节往返,由西突厥以得东亚情势也。

三、中世纪阿拉伯人之中国知识

七世纪初至八世纪,阿拉伯回教徒勃兴,建萨拉森(Saracen)大帝国,雄据西亚、北非、南欧,汲波斯、东罗马之文化,比八世纪中叶,其文物已蔚然可观。其时贸易殷盛,阿拉伯商人多往来中国南海及扬子江沿岸诸港,中国商舶亦出现于波斯湾,东方知识自然流入。其沿陆路而来之波斯、阿拉伯商人,亦越长安、洛阳而达辽东。751 年(唐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于怛罗斯(Tharaz)河畔,大食俘华人以西,安史乱作,回鹘人勤王而东,交通频繁,